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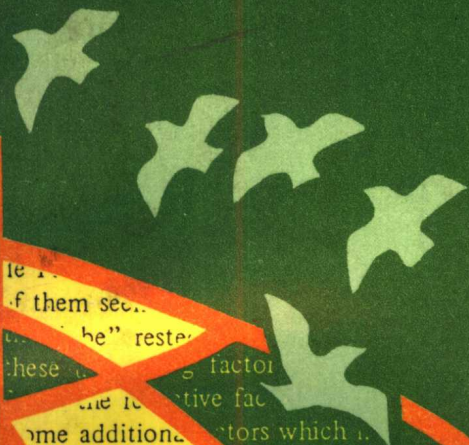
中国改革与

世界前景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现代译丛



le
of them seen.
the "restr
these
the relative fac
ome additional factors which i
ional system.
et us first turn to population and terr
opment of the population (from 1950/51 to
fourteen most populous countries of the world. Th
and are compared to the 1950/51 figures are given in bra
the largest power in the world in 1950. Thus
1961 was 0.25 or 25 per cent of that of t
and territory 5.8 per cent of the area of th
Looking at the figures one realizes at
the European members of the for
ories of West Germany, France
only to the ar
of Brazil and China. Ti
Mexico, India
somehow

时事出版社

现代译丛

中国改革与世界前景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时 事 出 版 社

中国改革与世界前景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75 字数: 226000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009-046-9/Z · 04 定价: 2.50元

编 者 的 话

中国改革的成就和它对世界的意义，举世瞩目。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哈丁都在他们的最新著作中不约而同地援用了一百多年前拿破仑的著名预言，称中国是“觉醒了的巨人”，到21世纪，世界上将有“三个超级大国”。同时，他们都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中会遇到的问题提出了看法，对此，我们不尽同意，但也值得我们思考或引以为戒鉴。

日本这个当今的经济大国下一步会怎样发展，是又一个举世关切的问题。至少有两个景象已经显露出来。一个是日本人自己在设计的：“改造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首先是在“西太平洋”。简明地说，就是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环太平洋经济圈”。另一个是美国人感到有理由害怕的，那就是日本挟其制造业和金融业的威力对美国发起“第二次冲击”——金融业的冲击，并进而“控制世界金融”。

以上两个问题在这一辑《译丛》中都有详细反映。当然世人关心的重大问题还很多，比如美国今后的战略和里根以后的政局、苏联政治的发展，等等，都需要深入了解和研究，只是限于篇幅，暂时只能稍作介绍，详情要留待在下一辑中同读者见面了。

目 录

• 中国的改革与前景 •

觉醒了的巨人·····	理查德·尼克松 (1)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哈里·哈丁 (22)
中国进入世界经济·····	尼古拉斯·拉迪 (60)
“终于到了中国”(书评)·····	托马斯·格里菲思 (75)
司徒雷登日记(下)·····	司徒雷登 (79)

• 日本经济趋向 •

日本环太平洋经济圈的构想

····· “日本国际论坛”政策建议	(108)
90年代的美日金融抗衡·····	布鲁斯·斯托克斯 (135)
当心日本控制世界金融(书评)·····	J·R·克劳斯 (142)

• 国际格局 •

论国际均势体系·····	沃尔特·S·琼斯 (144)
世界在动荡转变·····	理查德·里夫斯 (173)

• 美国政治 •

“并不那么宏伟的战略”(书评)·····	保罗·肯尼迪 (179)
里根的得与失·····	李·史密斯 (190)
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	鲍勃·伍德沃德 (198)

• 苏联政情 •

苏联“第一位现代化领导人”·····	休厄林·比亚勒 (217)
苏联对外政策思想库·····	埃勃哈特·施奈德 (219)
苏联的非正式社团·····	维拉·托尔兹 (233)
“背离列宁”(书评)·····	亚历山大·达林 (242)
河内之行见闻·····	约翰·H·埃斯特莱因 (247)
霍梅尼以后的伊朗·····	希林·亨特 (259)

觉醒了巨人

理查德·尼克松

编者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88年新著《1999年：不战而胜》中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提出了对未来的展望。书中第八章谈了中国和中美关系。

他认为当代的奇迹之一是中国肯定要成为21世纪最重要国家之一。那时世界上将有中美苏三个超级大国。

说邓小平是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他把中国人民的潜力释放出来了。现在中国经济欣欣向荣，但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会改变中国的性质。

说中美持久关系的基础已奠定。到21世纪中美关系会年复一年地得到加强，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互利的双边关系，会把世界和平与自由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下面是本书第八章的摘译。

中国在20世纪中历经艰辛，走过了革命和苦难、贫困和希望、政治和意识形态巨变，以及乱而后治和治而复乱的道路。在60年间，中国由古老的帝国变为年幼的共和国，继而又出现共产党专政。中国一直在摇摆，有时愤然把西方影响完全拒之门外，有时又小心翼翼地接受同西方的良好关系所带来的好处。中国是世界上最纯一的社会之一。但是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中它出现了内部交战状况。

中国在1949年革命后陷入了孤立处境，它敌视他人。在那些年头，西方许多人不信任中国，害怕中国。它是东方的神秘的、

一腔怒火的红色巨人，决心要把一个保持意识形态纯洁的惩罚性狂热法典强加于它的人民，而那个时候西方国家的人民正在经历战后爆炸性的经济繁荣。只有很少几位西方国家领导人花时间去研究中国或其曲折的历史。其中之一便是戴高乐。使他的某些反共的支持者感到惊异的是他在1963年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人问戴高乐原因何在，他回答说：“因为中国太大了，太悠久了，而受到的凌辱又太多了。”

在60年代我尚未出任总统时，我自己对中国的想法已开始改变，这是由于中苏分裂以及像戴高乐和阿登纳这样的政治家的劝告。他们俩都对我说，美国必须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但是，我也不会忘记1963年我在约纽市同赫伯特·胡佛的一席交谈，交谈是我在他89岁生日那天去拜访时进行的。他向我提出了相反的劝告。他说，“我们不应当同中国人打交道，因为他们是残忍的。”他在描述1900年他作为年轻的工程人员在中国的经历时，显然有些战栗。那一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这是人数不多的狂热分子集团反对西方人剥削的一次迅猛暴乱。义和团和镇压这次叛乱的政府军都犯下了骇人的暴行。胡佛和他的夫人回忆了当时看到成千上万具尸体流经他们住地旁边的大河的情景。

他们是一个野蛮世纪破晓时的见证人。20年后爆发了内战，孙中山的部队打倒了统治时间达2000年的帝国。在30年代，中国遭到了日本的残酷侵略和占领，中国政府说在这个时期中有2.2亿人死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又一次内战中以及在1949年毛泽东部队击败蒋介石后巩固共产党新政权的时期内，有500多万人丧生。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工业化运动和强行集体化（中国领导人令人啼笑皆非地称这是“大跃进”）时，有2700万人饿死。几年之后，毛泽东使他的国家经历了“文化革命”这场意识形态灾难。这场革命狂暴地打乱了他的千百万同胞的生活，在受过教育的人中留下的巨大创伤至今尚未痊愈。受害人之

一是邓小平之子邓朴方。狂热的红卫兵把他扔出了窗子，他从三楼掉下来。现在他不得不坐轮椅。

然而我们时代的奇迹之一是在20世纪灾难深重的中国肯定要成为21世纪的世界最重要国家之一。160年前拿破仑在谈到中国时说：“一个沉睡的巨人躺在那里。让他去睡吧！因为当他醒来时他会撼动世界。”这个巨人觉醒了。他的时代已来临，他准备撼动世界了。

中国在与别国交战和内部交战半个世纪之后团结起来了。仅仅在50年中，它的人民已从4亿增至10亿多。在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已摆脱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他消除了整个官僚计划体制的沉重压力，把世界1/5人民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了。如果中国继续走邓的道路，我们的孙子辈所生活在其中的将不是有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而是有三个超级大国的世界：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在1972年首次去访问的中国甚至还算不上重要国家。它是个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现在仍然如此。当时一些专家的结论是，中国之所以对我们的倡议表示赞同完全是因为他们希望进入西方市场和希望西方去中国投资。有一位专家预言，毛泽东要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会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要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做些什么？”这位专家说错了。1972年在我同毛泽东和周恩来举行总共20小时的会谈中，中国人没有提出经济问题。中国领导人心中重要的东西不是美国的金钱而是美国的力量。使中国和美国走到一起的是国家安全方面的盖过一切的必要考虑。

我们彼此的接近也许是战后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地缘政治事件。但是，最有意义的这类事件是60年代初期的中苏分裂。在发生分裂后，中国过去在莫斯科的意识形态导师和经济赞助人变成了对它有威胁的敌手。苏联军队结集在中国北部边界那边，苏联

的导弹瞄准中国的城市，苏联向中国的敌手印度提供援助，苏联在亚洲其他地方也有领土野心。这一切使中国感到不安，因此它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求助于苏联最强大的敌手——美国。中国和苏联都是共产党国家。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美国是这两者的天然意识形态敌手。但是，中国人知道苏联威胁着他们，美国对他们则无威胁。我1976年在北京曾对当时的党领导人华国锋说，有时候一个大国必须在意识形态和生存之间作选择。华表示同意。1972年，中国已经选择了生存。

正如北京的少数强硬路线者顽固地反对同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建立关系一样，我们作出的设法同中国建立新关系的决定对一些美国人也是有伤害的，这些人认为我们同共产党打交道会背弃我们的民主原则。但是，同中国人一样，我也没有其他切实可行的选择。如果我们没有采取主动行动，而且中国被迫回到苏联势力范围，那么苏联的共产主义侵略对西方的威胁肯定会比今天大。符合我们两国利益的作法是我们确立一种并非建基于共同理想（共同理想使美国同西欧以及全世界的盟国联系在一起）而是建基于共同利益的关系。双方都承认，尽管我们有深刻的哲理分歧，我们没有理由成为敌人，倒是很有理由成为朋友。这个理由就是我们都希望阻止苏联的威胁。

这种威胁仍然使我们感到不安。实际上，今天这种威胁比16年前更大了。包围之幽灵弄得中国人忧心忡忡。在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北越有友好关系。美国军队呆在南越和柬埔寨，阿富汗是中立的。今天，越南、柬埔寨、老挝和阿富汗都是亲苏和反华的。1979年，中国同苏联支持的越南发生了冲突，伤亡两万人。

但是，即使不存在苏联威胁，我们也必须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建立新关系。一个原因是友好关系会带来明显的经济和文化好处。另一个原因是原子时代的严

峻现实。当我在1967年会戴昭高乐时，他说：虽然他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不抱幻想，但是美国不应当“让中国继续陷于孤立和愤懑之中”。我回答说：“在10年（当时中国在核武器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内，我们将没有选择余地。我们同他们进行比今天更多的沟通是至为重要的。”现代世界经不起强国不能彼此沟通（尽管他们有分歧）时会发生的误解和错误判断所带来的风险。虽然我们同中国关系的疏远从纯粹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已成为我们和他们都吃不消的多余的意识形态负担了。核武器向许多人提出了许多问题。核武器向各国领导人提供了寻求共同基础的紧迫理由。

从长远来说，中美关系之所以会持久不是因为害怕心理，而是因为人们怀有希望。只要两国对于对方或对方的朋友和盟国不怀有领土野心，那么我们之间就不会出现障碍。我们不会由于彼此友好而有所失，我们倒是会得到各种好处。在仅仅16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在1949年到1972年，美国的对华贸易几乎等于零。中国现在仍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它发展的速度特别快。从邓小平开始实行改革的1978年到1983年，中国8亿农民——他们是改革的最早得益者——的个人收入增加了70%。一些专家预言，在下个世纪开始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西德。

然而，为了正确看待这一发展，补充如下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在2000年时，6000万西德人的人均收入将是每年2万美元，而中国10亿人的人均收入则为每年875美元。中国共产党的新任总书记赵紫阳最近实事求是地说，邓小平开始执行的现代化运动可能需要经过长达100年的时间才能使中国达到像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水平。赵在共产党世界中的前辈——特别是中国的毛泽东和苏联的斯大林——曾认为可以在几年中而不是在几十年间强行取得这种进步。千百万中国人和俄国人在由此而引起的大动乱中

丧生。一些分析家认为，赵提出的更为现实的预测看来像是降低了期望。我则认为这些预测完全具有中国人的风格。同东方和西方的许多领导人不一样，赵知道欲速则不达。但他也完全深信一个优秀民族的生产和创造性能量一旦释放出来，就必然会取得优异的成绩。

1969年我同戴高乐再次谈到中国时，戴高乐说：“你最好在中国的发展迫使你不得不承认中国之前承认中国。”他的话说对了。世界上最有才能的10亿人的潜能必然会使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巨人，成为一个军事巨人。我们在现在以及在20世纪余下的年头的目标应当是确使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巨人——不一定亲西方，但肯定不亲苏联。

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关系冻结20年的状况是两国人民之间的一种不自然的疏远。1972年以来的事态显示，两国人民都有许多能满足对方的东西。只要中国仍然与苏联结盟，我们就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彼此成为敌手。在这个障碍消除之后，我们很有理由成为朋友。

今天，美国和中国人民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伙伴。假如双方都坚持这一方针，到21世纪中美关系就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互利的双边关系。

中国的经济革命是其领导人观点的两个引人注目的变化的产物：他们对西方的新态度以及1978年邓小平开始进行的改革。1972年中美的接近使中国有了进入西方市场和获得西方技术的渠道。邓在1978年的改革使中国能够运用其新渠道。第一个变化是在中国认识到它需要有办法对付苏联军事力量的威胁之后出现的。第二个变化是在中国认识到如下一点之后出现的，即中国需要有一个办法，来取代那种势必使中国人陷入永久贫困的苏联经济模式。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大大离开了马列主义经济学说——是

由一位曾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进行第一次革命前的长征的领导人设计的。邓小平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有奉献精神的共产主义者。他参与了1949年缔造新中国的工作，对这个政权的巩固也作出了贡献。这些使得他成了毛和周的可信赖的下级。但是，他对毛的大跃进的失败感到苦恼，这使他重新考虑他信守马列主义教条的态度。邓最早在60年代提出的初步改革建议促使毛派激进分子重新考虑对邓的看法。1967年，他流放在国内，但是1973年他作为周恩来的可能继承人再次出现。周本人为实现经济现代化而采取的早期审慎步骤也为毛所阻。在1975年，邓小平和当时身体已极差的周恩来开始研究“四个现代化”问题——即指导今天中国的这些原则。当时激进派再次大动干戈，又流放了邓小平，并使周恩来在一生的最后几个月中难以运用自己的权力。但是，国家缔造者终于战胜了狂热分子，“四人帮”被粉碎了，两次被打倒的邓小平成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我同邓小平会晤过四次，即1979年在华盛顿，1979年、1982年和1985年在北京。每次会晤后我离开北京时对他的坚定决心和他的充分自信都有更加深刻的印象。每一次，我对这位领导人的印象都因他所领导的国家正发生的变化而更加巩固。人民满怀信心，同时对西方和美国的事物又十分好奇。我1972年会晤毛泽东和周恩来时，为我们做翻译的年轻女子穿的是肥大的灰色毛制服，她们留着朴实短发。中国共产党人似乎太认真看待亨利·希金斯的告诫了：“女人为什么不能像个男子呢？”当我1985年访问广州时，我们的服务员是漂亮的中国姑娘，她们穿高跟鞋和时髦的花旗袍。我们的主人说：“你们会注意到我们今天衣着的颜色增多了。我们的意识形态也是如此。”

如果认为这两个变化有莫大的意义，那就天真了。中国领导人仍然是共产主义者，不是资本主义者。尽管他们热情好客而且似乎无止境地渴望与西方接触，但是他们的广泛经济改革的目标

不是改变中国的性质，而是引进能够在中国发挥作用但又不改变中国性质的那些力量，以使中国强大起来。这种做法同中国的传统是一致的。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从未被外来入侵者或外来思想所长期征服。中国同化了它们。1967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谈论毛泽东的革命时对我说：“毛泽东是在一块马赛克上绘画，下雨时他的画就会被冲洗掉，中国会依然故我。”

在邓小平1978年上台之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实际结果是使每个中国人都过同样的穷日子。今天，一些人正获得机会摆脱贫穷。邓小平承认他面临的选择是以贫穷为代价求平等，还是以不平等为代价求进步。他把他的极其贫困的国家的境遇同中国人在新加坡和香港以及台湾所取得的成就作了一番比较后，决定选择存在某种不平等现象的进步，而摒弃了死板的平等和无法进步的状况。我是在1972年初次看到中国的，那时中国正处在文化革命刚刚过去的惨淡岁月。从此以后外表上的变化是令人吃惊的。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民现在可以买电视机了。大城市街道上挤满了身穿西式风雨衣和运动服的人，青年人看美国电影，听西方摇摆乐团的演奏，吃肯德基炸鸡。一度把短发压在毛式帽下的妇女现在在北京的伊丽莎白·阿登酒吧间里与人约会。来自远方的旅游者蜂拥至首都，挎着日本制照相机，游览长城和故宫。1972年，北京的大多数人以步代车。今天，他们骑自行车，有些人还有摩托车。

更有意义的是，中国经济欣欣向荣。1986年经济增长率为11%，是西方工业国的平均增长率的3倍。最惊人的成就是农业方面。在邓小平实行改革后的两年中，农民收入增加超过了先前毛泽东时代的20年。由于实行了新的鼓励性制度（允许农民保留和出售超出政府定购额的产品），中国现在生产的粮食足够供养10亿人民，还有多余的粮食可供出口。中国驻美国大使韩叙最近向我指出，中国的可耕地只是世界可耕地的6%，但现在供养了

世界22%的人口。形成对照的是，俄国农民仍旧在斯大林式的集体农庄中劳动，他们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供养苏联2.5亿人。

西方一直在屏住气注视着戈尔巴乔夫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对人权的每次小小的让步，每个微小的改革或“公开性”行动，都博得了西方观众的热情鼓掌，因为他们非常热切地期待着每位苏联新领导人会采取的大行动。确实，由于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军事大国的地位，它所发生的事态具有特殊意义。但是迄今戈尔巴乔夫仅仅显得愿意为斯大林制造的那部已磨得作喘的发动机加润滑油。邓小平通过其使中国农业、工业和科学现代化的有条不紊的计划，已开始彻底重建中国的发动机。因此，年轻、精力旺盛的戈尔巴乔夫虽然衣着合身，能说会道，但至少在目前他还得在他的年已84岁的中国同事后边就座。这个中国同事穿着毛式服装，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以喉音发笑，脚边有一个痰盂。邓正在干的是迄今戈尔巴乔夫只能梦想的事。

邓行动大胆，冒了很大风险。减少中央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威会威胁到共产党政体中那些靠运用这种权威而大权在握的人。改组中国的武装部队会威胁到军界权势。运用西方经济自由的概念也有风险，会使中国人性格中的极端仇外的倾向复活，这种倾向曾助长过义和团运动、文化革命和四人帮的短暂专权。

一般人认为中国的改革者若不太大改变中国的极权政治制度就不能继续允许存在经济自由。许多专家说，如果农民和工厂经理获得在市场上采取行动的自自由，他们也会要求获得政治领域中的行动自由。如果党控制经济的权威受到限制，其控制人民的权威也会削弱。

同伟大领导者常常能做到的一样，邓小平看得比这些专家远，他探究他能看到的但是这些专家却想像不到的未来远景。确实，他现在做的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从未做过的事。但是现在谁都不能说这件事做不成。最终，如果情况证明一般人对邓的改革的看

法是错误的。那么原因很简单：改革是行之有效的。

邓小平的改革在年迈的强硬路线保守分子中也许是不受欢迎的，但改革在人民中是受欢迎的。许多人自中国革命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收入足以添置诸如电视机和冰箱之类的消费品，而这些东西在毛的中国是不可想像的。流通中的货币的增多引起了某种腐化和通货膨胀。由于工业部门无力生产足够的消费品以对付需求的增长，农村和城市之间可能形成紧张关系。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而不必改变改革的总方针。绝对无法改变的是中国人民对未来的新期待。历史的不愉快教训之一是从未尝到过繁荣和自由的人能够无限期地在没有繁荣和自由的情况下生活。但是，一旦人们得到它们，人们就不会不战斗而轻易再放弃它们。邓的改革触发的政治动荡与北京的强硬路线分子万一扼杀改革后会出现的政治动荡相比完全算不了什么。

当邓小平在去年的党代会上把对中国政府的日常控制权让给赵紫阳时，西方的许多观察家们侃侃而谈，认为一个共产党领袖自愿得体地下台让得到经心培育的较年轻的继承人继续执行他的政策是多么不寻常。这些观察家没有能看出这在任何形式的政府（包括民主政体）治理下都是不寻常的事。戴高乐贬低了显然会成为他的继承人的蓬皮杜。丘吉尔贬低了艾登。阿登纳贬低了他自己的能干的财政部长艾哈德，贬得十分严酷，以致艾哈德向我描述阿登纳对他的一次轻蔑时眼泪夺眶而出。日本的吉田茂则是个少见的例外。他经心地使像池田、福田和佐藤这样的人作好准备能在他离开舞台后供职。结果，在将近25年中，对日本的治理一直是按照吉田的保守和亲西方的原则行事的。

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不仅仅是制度。领袖也是重要的。西方以能够郑重地和有条不紊地移交政府权力而称著，但是这个过程却会使政策乱七八糟。在专政和极权国家的政府中，会出现强行把领导人赶下台的事（如去年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被革职），

但是基本国策不会变化。邓小平在让位时留下了他希望留下的人和政策，邓创造了一个高明的政治奇迹。

同日本的吉田一样，邓小平没有感到自己受到了他在政府中的手下能人的威胁。他倒是认为，一个领导人的政策能由他的受到很好栽培的继承人在这个领导人死后继续予以贯彻，就是最后胜利。今天，他身体仍然很健康。但是邓意识到自己的日子越来越少了，终于认识（这种认识确有道理）到，能使一个领袖不朽的关键是他为人很谦逊，承认别人可以也必须接替自己。人们将铭记邓一生的许多杰出成就。但是在历史上很少有强有力的领袖能自己正视——而不是在他人的逼迫下去对待——生命总有尽头的问题。邓讲了一句简单的话：“我是要在思想不行之前退下来。”这话是显示他伟大的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

撤掉胡耀邦的职务一定是使他很苦恼的事。赵紫阳是邓的第二选择，但确是非常好的人选。赵是强硬而很理智的经济学家和从政专家。但也很有风趣，甚至很有领导者的魅力。在去年党代会期间的一次鸡尾酒会上，他向西方记者保证他和他的同事穿的非常合体的西服不是进口货。为了证明他的话，他抓住身边的一位高级官员的西服领并把它翻过来，使人们都能看到标签上写着“中国制”。

赵热烈拥护邓的政策，甚至进一步采取了一些有希望的新步骤，给小工厂以更大的自由，允许农民购买和出售政府租借给他们的土地，以及制订使共产党不介入日常政府事务的新规定，最后这一点很可能更为重要。许多反对改革的强硬路线分子已被赶下台。但认为邓的改革步伐过快的人仍然存在。

但是，中国在邓的有希望的新道路上已走得这么远之后还会再后退，这是很有疑问的。一个国家也像一个人一样，能够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中国完全是在全面经济计划的实验已完全失败或者已弊病丛生之后进行其允许有部分经济自由的实验的。

在邓作为周恩来和毛泽东的门生的年代，中国在国际上毫无活力，低声下气地依靠苏联的慷慨施舍。在大跃进失败后，邓知道中国人民被弄得无法在国内发挥他们的潜能，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也被弄得无法发挥国家的潜力。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最大遗产之一是他们最终还是使中国转向西方从而使它进入了20世纪。他们俩的继承人的遗产将是他使中国摆脱了过去意识形态束缚，并使它作好准备将来在国际上起领导作用。

邓是作为一个有青年人思想的老年人而上台的。在16世纪，法国的一位学者在生命垂危时懊恼地写道：“年轻时能知晓就好了，年老时能够干事就好了。”邓现在是84岁。他既知晓，又能干事。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产生了像爆炸一样的巨大力量，使全球1/5的人急速向繁荣和世界领导地位迈进。

西方有很多很多的天真观察家研究邓时硬是认为他是中国的托马斯·佩因。佩因是个民主革命家，他的长远计划是结束共产党统治。邓的行动确实是戏剧性的，甚至是鼓舞人的。但邓是个改革家，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不希望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或者一个民主的中国。然而他也不是他的意识形态的俘虏。他尤其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希望中国强大，具有推行会使中国在21世纪中成为超级大国的那种对外和贸易政策所必需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虽然邓的直言不讳的目标不是更多的政治自由，但如果经济改革卓有成效，随后可能会进行政治改革。这种改革必须是渐进的，稳妥的——其速度足以跟上人民的期待，但又不能太快以致使当前的政治结构无法应付。邓本人说得好：“如果我能使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生活，那么我认为政策本身就是其继续性的可靠保证。”取得成功的关键是时间。要是有足够的的时间，今天对中国非常新鲜的东西就会慢慢成为正常的事。经历改革并从中得益的较年轻的领导人会变成继续并扩大改革的鼓吹者。邓的见解的成